



## 辛 莽

辛莽(1916年-2007年)原名吴裕春,广西合浦县人。历任华北大学教员、北京市美工室副主任、北京市美术公司主任、北京画院专业画家。1935年入合浦省立十一中学师范专科,同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同年加入共产党。

1939年春进鲁艺美术系学习,同年5月任教。后在华北联合大学美术系任教。1944年回延安在鲁艺美术系任研究员。1949年12月任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副主任、北京市文艺工作委员会委员。曾任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1980年当选为北京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从艺的一生,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革命历史画创作方面颇有成就。1950年主持并执笔创作天安门城楼巨幅毛主席画像,获得成功。1951年创作《毛主席在延安窑洞中著作》,成为时代的精品,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曾赴朝鲜战地写生,并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设计、创作工作。1957年创作大型军史画《转移》,1975年创作历史画《柯棣华参加反英游行》等。画风严谨,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晚年探索油画风景写生,笔法奔放、洒脱。

## 为毛泽东画像的人

### 奔赴延安

在家乡合浦县读中学时，辛莽受到了地下党的影响，参加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至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极为艰难的阶段。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制定了“干部教育第一”的政策，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新干部，培养抗战急需的人才。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扩大，大批文化界进步人士和全国各地爱国青年奔赴延安，肩负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重任的鲁迅艺术学院在陕北延安应运而生。

鲁艺每届招生都会印发明确的招生简章，不仅在延安等解放区公开发放，还会通过邮寄等方式向重庆、杭州、上海等国统区或日军占领区传送。很多艺术青年都是通过“鲁艺”的招生简章了解到招生信息，从而不远千里长途跋涉，奔赴延安，投身于以艺从戎的抗战救国之路。此时，辛莽义无反顾，加入奔赴延安的行列。

辛莽到达延安后，与占元、华君武、米谷、时乐漾等一起，先是在陕北公学经历短期培训。到1938年底，再去报考鲁艺美术系，他们考试科目包括笔试和面试两方面：笔试内容一份是政治题，另一份是专业题——要求交一幅素描或自己创作的作品。面试就是政治处再找去谈谈话，进行一些考察。

鲁艺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综合性艺术学校。1938年4月10日在延安成立，各专业的学制最初规定为6个月。1939年春，辛莽考入了鲁艺美术系，为第三届学员，这一届共有学员38人，如秦兆阳、流金、焰炎、辛莽等。

1939年5月，第三届学员毕业，辛莽留校做教员。是年夏，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鲁艺与陕北公学、工人学校、青训班合并，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开赴前方。

毛泽东同志发表《青年运动的方向》，号召青年投身到群众火热的斗争中去。中共中央也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

1939年6月24日，鲁艺开始军事演习，将全院人员编为一个纵队，每日进行操练。为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鲁艺于7月11日奉命组织大部分学生由副院长沙可夫率领，与抗大、陕北公学、青训班、工人学校等组成“八路军第五纵队”。这天早晨，鲁艺全体师生召开欢送大会，沙可夫和徐一新讲话。大家边走边唱：“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又唱校歌：“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踏着鲁迅开辟的道路……”登上了征程。随队出发到前方的有吕骥、沃渣、崔嵬、丁里、汪洋、辛莽、钟惦棐、秦兆阳、王莘等九十人。

1939年11月28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留在延安的鲁艺部分师生恢复鲁艺。鲁艺的教育方针是：团结与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才，以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毛泽

东为这个学校题的校训是：“紧张、严肃、刻苦、虚心”。学校初办时设戏剧、音乐、美术3个系，后又增设文学系。

1940年后校名全称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40~1941年期间，学校加强了专业化的学习，各系一律延长为3年，并且注意提高教学质量。为了紧密联系实际，鲁艺设有文艺工作团、实验剧团、歌舞团、美术工作团以及其他的科研组织。

鲁艺建校以后，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干部，对抗日战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43年4月，鲁艺并入延安大学。

1944年，辛莽回延安，在鲁艺美术系任研究员。1946年4月，辛莽与庄言、胡蛮、罗工柳编绘“新洋片”《赵天顺翻身》。

### 到北师大任教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后，中央教育部派卫天霖先生组建北京师范大学美术工艺系。1950年，北师大美术工艺系聘请庄言、左辉、辛莽、温庭宽、张松鹤、毕成、张秋海等来校任教。

此后，还有一大批名家来到北师大任教，如1951年聘请的李瑞年、张安治、刘亚兰。当时美术工艺系设立有绘画、理论两个教研室，1952年，根据苏联专家建议，改美术工艺系为图画制图系。1953年，聘请吴冠中、余钟志来校任教。

新中国的美术学科在中国美术教育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在当时制定美术学科教学体系和课程方面，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科起着中坚作用，在中国美术学派建立中也有着独特的价值。

其中重要的美术家很多，卫天霖、吴冠中、李瑞年、左辉、张秋海、庄言、张松鹤、刘亚兰、张安治等等，而辛莽作为历史画家被聘用。另外，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前就设有绘画系，并以中国画教学而著称。合并后也有个别教员留在师大，融入师范大学的美术教育。

辛莽在鲁艺美术系学习时，因鲁迅先生对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倡导，以及当时的环境限制，木刻版画这种艺术形式受到了美术系教员和学生的青睐，当时延安地区以及抗日根据地的木刻版画极为兴盛。它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的战斗、生产、文化生活及社会面貌，在全国乃至国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那时候，辛莽曾学过版画，后来，辛莽改为专攻油画。辛莽到了北师大后，以教授历史油画为主。

### 为天安门城楼巨幅毛主席画像

说起辛莽创作天安门城楼巨幅毛主席画像的过程，还有一个不寻常的故事。

我们知道，在国庆期间，北京天安门是五彩缤纷的，那才叫花团锦簇。要知道，这样一个花篮，造起来可是动用了起重机。这就是天安门前排场最大的工程吗？不是。其实，

真正备受瞩目的国庆换新系列，在于天安门前的毛泽东画像。每年的9月27日晚上11点，毛主席像开始换新。施工人员动用了两辆吊车和一辆货车，持续1个多小时。这在“画像界”也算是绝无仅有了。画像高6米，宽4.6米，加上框后高6.4米，宽5米，总重量达1.5吨，这是全亚洲最大的手工绘制的肖像。可能许多人不知道，天安门前的毛主席像是年年更换的，而且每年都在国庆。这个惯例已经持续了六十余年。

为什么要年年更换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迄今为止，毛主席像仍然由手工绘制，一般是在8月“立秋”前后开始画，国庆时再换新。画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会很容易褪色，最多坚持一年，所以就必须年年更换了。毛主席像经历了董希文、周令钊、辛莽、张振仕、王国栋、葛小光等画师，其风格也有所改变。

从1949年到现在的70年时间里，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一共经历过“八次更迭”。第一幅画像庆祝北平解放大会，悬挂时间是1949年2月12日，主笔董希文。第二幅画像纪念“七七”抗战12周年大会，悬挂时间是1949年7月7日，主笔董希文。第三幅画像开国大典，悬挂时间是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主笔是周令钊。第四幅画像，悬挂时间是195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主笔是辛莽。

1950年5月1日，毛泽东主席免冠画像挂上天安门城楼。担任主笔的是人民美术工作室的辛莽，左辉、张松鹤协助绘制。1950年初，胡乔木将辛莽邀请到中南海，布置绘制毛主席巨幅新画像的任务。辛莽接到任务后，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翻看了许多不同时期的毛主席的照片，经过认真挑选之后，选中了一张毛主席免冠、双眼略上看的半侧面像。辛莽从解放区来的画家中挑选了左辉、张松鹤等人，在共同研究制定绘画方案后，左辉、张松鹤站在脚手架上，辛莽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边看边指挥，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毛主席画像画好了。

第五幅画像，悬挂时间是1950年“十一”至1952年“五一”，主笔是辛莽。1950年，为庆祝建国一周年，中央决定重新制作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红灯笼，悬挂国徽。而毛泽东的画像也不能再用战争年代的形象，因此，毛泽东画像脱下了戎装，以新的形象展现在人民面前。辛莽所画的这一版毛泽东像，也是脱帽半侧面像。他注重对毛泽东眉宇和眼神的表现，力求在描绘主席慈祥和善的同时，表现出他性格中敏锐、机智和洞察一切的层面。

这里有个小插曲。第四个版本的毛主席画像只挂了一天。那是一幅毛泽东身穿草绿色呢子制服、面部偏左的画像，在1950年5月1日劳动节当天悬挂在天安门上，但由于有人反映毛主席眼神没看向群众，第二天就撤了，是悬挂时间最短的版本。辛莽又赶紧加工了第五幅毛泽东平视的画像，一直挂到了1952年。

### 赴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

1952年3月，辛莽参加了中国文学艺术家访朝代表团，奔赴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嗣

后，还合作出版了《朝鲜战场素描集》。

此次中国文学艺术家访朝代表团奔赴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活动，由巴金任团长。这些文学艺术界的大家，通过观摩朝鲜战场，创作许多很好的作品。

辛莽等人合著的《朝鲜战场速写集》，直到1954年7月，才由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

速写集的前言，对画家们的努力与成果，作了很高的评价——

在这本集子里，汇集了古元、西野、罗工柳、辛莽等八位美术工作者在朝鲜战场的速写一百多幅。这些作品都是它们深入观察朝鲜战时生活的点滴记录，是他们准备创作的素材。虽然多数作品仅只寥寥几笔，但均能把朝鲜战场上的人物和景色的现象特点生动地表现出来。因此它能给我们极亲切、自然、真实的感觉，而同样地能使我们从这些朴素的画面上体会到朝鲜战时生活的情况，以及朝鲜人民、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不可战胜钢铁意志，和坚决勇敢打击美帝侵略者的崇高的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

### 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自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奠基，1952年8月1日开工到1958年5月1日落成。它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由国家兴建的大型纪念碑，无论从时间、地点、体积、造型、组织以及经济投入等方面，都是新中国美术史上最为重要的大型公共艺术工程，它既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代表了新中国纪念性建筑与雕塑艺术的最高水平。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型公共艺术项目，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个建筑、雕塑、书法等综合性的艺术工程，以中央美术学院画家、雕塑家为主的一批优秀艺术家参与了这一公共艺术，他们和国家领导人、建筑师、工程师、石工等共同创造了新中国艺术史上的奇迹。而辛莽则是人民英雄碑建设群体中的参与者之一，为这一艺术工程呕心沥血、尽职尽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52年2月，人民英雄纪念碑工程的美工组成立，工作走上正轨。在组长刘开渠的领导下，美工组于1952年6月拟定了十分明确的工作报告和计划，共分为三个阶段，主要内容包括：一、根据十块浮雕题材学习文件和近代史；二、各小组根据题材内容需要访问收集素材；三、勾出绘画初稿送上级和美术界征求意见；四、讨论碑形和浮雕内容；五、根据雕刻需要进行基本练习；六、依照新碑形进行浮雕起稿；七、分组考察体验生活，到各地研究古代雕刻；八、整理修改浮雕稿送上级审查。

在美工组，刘开渠为组长，副组长为滑田友、张松鹤、吴作人、彦涵。组员有郑可、王朝闻、辛莽、古元等十八人。

这时的美工组根据纪念碑十块浮雕题材，学习近代史，借北京东城校尉胡同中央美院大教室讨论起稿。并且按纪念碑浮雕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大组、十个小组，以及研究组、秘

书组。其中南面组的组长为王丙召、辛莽。南面组又分为三个小组：游击组组长张松鹤、辛莽，组员陈淑光；解放组组长刘开渠、彦涵，组员夏肖敏、凌春德、吴汝钊；禁烟组组长王琦，组员沈海驹。在1953年6、7月间，参与纪念碑浮雕画稿的辛莽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回到了单位。

完成后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其下层须弥座束腰部四面镶嵌着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分别以“虎门销烟”、“金田起义”、“八一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胜利渡长江”为主题，在“胜利渡长江”的浮雕两侧，另有两幅以“支援前线”、“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为题的装饰浮雕。浮雕高2米，总长4.68米，雕刻着170多个人物，生动而概括地表现出我国近百年来人民革命的伟大史实。

在这些浮雕中，《抗日战争》的画稿是辛莽的，雕刻是张松鹤的。1952年5月辛莽开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主题设计与绘制。它是一幅“抗日敌后游击队”图，浮雕上显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区敌后游击队的场面。

### 到北京画院任教

1956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上，著名画家叶恭绰和陈半丁共同提出“拟请专设研究中国画机构”的提案，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同年6月1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会议，通过了文化部“北京与上海各成立一所中国画院”的报告和实施方案。文化部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经过一年时间筹备。成立时，周恩来作了长篇讲话，规定了画院是创作、研究、培养人才、发展我国美术事业、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学术机构。

北京中国画院成立时，入院的画家由文化部直接聘任。著名画家齐白石、叶恭绰、陈半丁、于非闇、徐燕孙、王雪涛、胡佩衡、吴镜汀、秦仲文、汪慎生、关松房、惠孝同、吴光宇、辛莽等被聘任。艺术大师齐白石任名誉院长，叶恭绰任院长，陈半丁、于非闇、徐燕孙任副院长。

1965年，画院增设油画、雕塑、版画等专业，“北京中国画院”更名为“北京画院”。进入新时期，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北京画院开始了第二个创作、出版、研究与教学的辉煌时期。这个阶段，由北京画院主办或参与的大型美术展览在国内外频繁亮相；北京画院画家的作品，连续在国际国内的大型美展上获得各种奖项；大型学术刊物《中国画》得以复刊；北京画院的中国画教学规模逐步扩大。总体上显示出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发展局面。

1985年，人民美术出版社还出版了《辛莽素描选》。